

国民政府就西藏“外交局事件”的对英交涉

冯翔 喜饶尼玛

内容提要：1942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擅自设立“外交局”，引发民国西藏史上的“外交局事件”。事实上，“外交局”成立后，即遭到国民政府的坚决反对，而英国却看到了他们垂涎已久的机会，不断利用“外交局”作为推行其前进政策的“创新工具”。在蒋介石“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的强硬表态下，开启了抗战中的国民政府与英国的激烈外交博弈，持续数年的外交交锋有效地抵制了英国对中国在藏主权的歪曲，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

1942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擅自设立所谓“外交局”，要求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通过“外交局”来与其接洽¹。时值滇缅公路被切断，中英协商经西藏地方来为中国修建补给线事宜，原本就对修路事宜推诿塞责的西藏地方政府这时竟然擅自设立一个处理“外事”的机构，这引发了蒋介石的震怒。最终在中央政府威胁以军事手段解决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承诺不再逼迫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发生联系²，这正是民

1 《孔庆宗为报西藏设立外交局事致蒙藏委员会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841。

2 《噶厦为与国民政府洽商汉藏关系事致西藏驻京办事处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2851。

国西藏史上著名的“外交局事件”。虽然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外交局”却并未撤销，这就给英国人留下了活动空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藏地方政府非法成立的“外交局”，除英属印度外，再无政府与之有过联系。这样的机构，何谈“外交”？它在更真实的意义上，只是英国在所谓的“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博弈的一个“创新工具”。³

一、重新定义“宗主权”

1943年3月15日，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美访问期间，谈及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并确定了在宋子文访问英国时继续就此议题进行讨论。一方面考虑到蒋介石因“外交局事件”而对藏用兵的威胁是继赵尔丰之后，再次出现一个强势中央政权可能结束西藏地方的“自治”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参战，战场上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逐渐失衡，英国方面预计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将成为远东地区的领导者，英国非常担心中国在战后威胁到英国在南亚及东南亚的战略利益⁴。具体来说，他们“贼喊捉贼”地担心中国利用“宗主权”⁵的名义来“将西方国家在这儿或那儿的殖民地纳入到自己的轨道内”。⁶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在宋子文到访之前，重新思考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问题。英属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有比较激进的看法认为，英国应该彻底抛弃“宗主权”，促成西藏的“独立”，以达到作为印度的“缓冲国”的作用⁷。

但这样激进的看法显然无法在英国政府内得到普遍认同，印度事务部大臣里奥·艾默里(Leo Amery)也一再提醒英属印度政府的对外事务大臣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⁸对于印度与西藏地方边界的问题⁹不能过急，否则“将激起中国和美国的通俗报

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H. 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9th July 1944.

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Tibet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suzerainty, April 10, 1943.

5 宗主权：是指国家对其属国的内政及外交拥有干预的权力，英文里的宗主权“Suzerainty”原本是用来形容奥斯曼帝国及其周围属地的封建关系。在所谓的“西藏问题”上，“宗主权”是英俄两国出于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而强行加到中国之上的，历届中国中央政府皆申明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主权，而非“宗主权”。关于此问题，可参见张曦：《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1）：47-57；张皓：《“宗主权”：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争论焦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1）：113-125。

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Ashley Clarke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April 29, 1943.

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Tibet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suzerainty, April 10, 1943.

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Tibet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suzerainty, April 10, 1943.

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Tibet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suzerainty, April 10, 1943.

业一致的宣传，认为我们在此进行古老的帝国主义者的游戏。”¹⁰

这一时期英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为此，英国人也咨询了美国国务院，但得到的答复是：“就美国的认识而言，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构成中华民国领土的地区。”¹¹ 英国历史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对此回复的解读是：“无论宗主权到底意味着或不意味着什么，也不管 1911 年清朝覆灭后到底发生或没发生过什么，事实是：美国政府实际上永远都认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¹²

受到美国态度的限制，英国也不得不谨慎地考虑这一问题。1943 年 4 月底，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阿什利·克拉克（Ashley Clarke）提出：“我们应当清楚地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大西洋宪章》造成的新形势下¹³，我们先前持有的态度已经不再有效”，¹⁴ 并决定如果抛弃宗主权的想法得到印度政府和驻华大使的支持，那么这个想法将被提交给内阁¹⁵。

在多部门的讨论之中，受卡罗影响极大的印度总督¹⁶ 显得非常不安，“（驻重庆）大使馆的台克满¹⁷ 的中国迟早将收回西藏的观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们有必要修订我们的西藏政策。”¹⁸ 印度事务部方面，他们非常欣赏阿什利·克拉克对宗主权的态度¹⁹，但认为“中国的宗主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²⁰ 如果抛弃这一政策可能会产生如下后果：首先，“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将很难阻止她收回西藏”，那时英

1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undated.

11 美国国务院外交关系文件，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5, 1943, 893.24/1594, [Document 53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12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Roxford Books, 1989: 319.

13 《大西洋宪章》中的第三条的内容为：“他们（指罗斯福和丘吉尔）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

1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Ashley Clarke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April 29, 1943.

1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Ashley Clarke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April 29, 1943.

16 卡罗组织了一个名为总督研究组（Viceroy's Study Group）的秘密社团来为总督出谋划策。

17 艾瑞克·台克满（Sir Eric Teichman, 1884-1944 年），英国外交官和东方学者，在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接受教育。在中亚进行过数次旅行。1917-1918 年参与调解第一次康藏纠纷。在英国外交界具有一定名气，被形容为“风度翩翩的人物”。台克满去世前曾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顾问，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卡罗口中的“失败主义者”，著有《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 West China*）、《领事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和《中国事务：对中华民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考察》（*Affairs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Recent History and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等书。

1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May 3, 1943.

1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Mr. Peel, India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May 8, 1943.

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Mr. Peel, India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May 8, 1943.

国将颜面扫地。其次，需要使该行为合理化，来说服议会和美国，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根植于历史之中”。再来，“这可能会在面对中国时非常尴尬，特别是我们在对抗日本人时几乎无所作为。”²¹

5月18日，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举行了一次会议，基本达成了一致并草拟了文件，以待战争内阁同意，“除非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否则我们将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²²该文件最终于1943年6月23日得到战争内阁的批准²³，并于7月7日下发给驻重庆和华盛顿大使²⁴。

但英国人似乎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一心一意地维护着强加到中国头上的“宗主权”，甚至“宗主权”这个概念都从未在世界其他地区被这样试图去精确定义。而英国人的这一系列举措的真正弱点在于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从未承认过“宗主权”的存在，从清朝外务部的那桐、唐绍仪到北洋政府的顾维钧，从宋子文到蒋介石本人，全都明确地表示中国在西藏地方拥有的是主权。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古老的、封建式的“宗主权”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被历史所抛弃。

英属印度对外事务大臣卡罗对内阁的这一决定是失望的，他想要走得更远。他在给印度事务大臣的秘密电报中称：“福勒（Fowler）提出的宗主权含义是指对半独立或内部自治的国家的名义主权，这可能被推定为对任何形式的西藏拥有外交权利的排除。”²⁵这显然不能满足英属印度政府的胃口，作为印度边界事务的决策者，在阿富汗已经成为“帝国的坟墓”²⁶的教训下，西藏成为卡罗脑中名为“蒙古边缘”²⁷的印度防卫体系的基础。

2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Mr. Peel, India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May 8, 1943.

2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Draft Instructions to H.M. Representatives about the policy of H.M. Government towards Tibetan relations with China, May 18, 1943.

2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6, Statute of Tibet, War Cabinet, June 23, 1943.

2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7, Extract from War Cabinet Conclusions 94(43), July 7, 1943.

2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6,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ne 1, 1943.

26 天然的成为防御苏联的屏障。

27 “蒙古边缘”：1940年，也就是卡罗正式主政印度对外事务部的第二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蒙古边缘》的文章，该文是卡罗防卫印度思想体系的浓缩，文中的“蒙古”其实指的是蒙古人种，即今天统称的亚洲族裔。文章将印度防卫体系划分为三层：第一层是防止西藏对喜马拉雅山地区国家的侵略；第二层是防止中国恢复在西藏地方的权威，将西藏作为与中国的缓冲区；第三层是帮助中国抵御日本和苏联。文章末尾，卡罗总结道，“我们的利益在于，引导中国与印度、西藏合作，以抵抗俄国和日本具有威胁的渗透行为，并且维持西藏作为一个完整的国际单位的状态。实际上，理想状态是在1914年半流产的三方条约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印度不能承受任何大国取代中国以控制拉萨的代价；其次，印度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个我称之为‘蒙古边缘’的不可分解的利益同盟之中寻求保护，而它的瓦解将使印度的防线洞开。”

这样的情况下，一边侵蚀中国西藏的土地，一边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就此问题进行交涉，既获得了战略要地，又造成西藏地方在“外交”上的“独立”要素，为日后实现“缓冲国”的目标做好铺垫。为此，卡罗提出，“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继续通过新成立的西藏外交局来与拉萨打交道……我们应该准备好考虑在印度土地上任命或设立西藏的代理机构，理由是在印藏之间，有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事务要处理，便可以将这个任命合法化以作为英国驻拉萨使团的补充。”²⁸

卡罗的建议中有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卡罗想要利用西藏地方政府的“外交局”来与其打交道，哪怕他自己也曾表示过“无知和低效的部分在所谓的西藏外交局上，正在变得令人无法忍耐”²⁹。卡罗这么做不过是想要造成西藏地方“外交独立”的印象。第二，在上述的基础上，卡罗其实想要在印度的土地上设立一个类似于“西藏领事馆”的机构。第三，“作为英国驻拉萨使团的补充”，补充的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本质上卡罗想要的，不过是对实现“缓冲国”目标的补充。卡罗知道他的建议一定会被英国驻重庆大使激烈地反对³⁰，为此他甚至在电文最后提醒到：“这封电报将不会复述给重庆。”³¹

但卡罗也未能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支持，“我们同意我们当前应该继续与西藏政府打交道，但对于在新德里设立西藏官方代表的建议，我们并不满意……无论如何，我们建议，这个想法不应该由印度政府来植入到西藏人的头脑中。”³²

虽然提议受挫，但卡罗与所有印度次大陆上的高级官员一样，只要在职权范围内，他们并不太在意英国外交部的看法³³，“保卫印度”的思维百年来早已根深蒂固。接下来，卡罗要做的，便是不断怂恿西藏地方政府的“外交局”，以制造“缓冲国”。

2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6,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ne 1, 1943.

2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6, From Foreign, New Delhi to Political Officer, Sikkim, 9th March 1944. “

30 英国驻华使领馆在1927年之后对“西藏问题”不甚积极，甚至对英属印度政府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如驻华公使蓝浦生曾对印度总督表示，“我所不赞成的是，我们依靠人为的阻碍或者说我们自己设计的障碍来使中国人和西藏人相分离。这些阻碍总有一天会失效的——中国和西藏的传统联系太过强大，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如果到那时，我们仍然试图支持这些阻碍，结果就是在拉萨颜面尽失，并且一个充满敌意的中国将会在西藏出现。”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17051, Sir M. Lampson to Sir V. Wellesley, June 2, 1933.

3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6,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ne 1, 1943.

3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6, From Ashley Clarke to Rumbold, India Office, June 11, 1943.

33 例如卡罗的对外事务部大臣职位实际的权力运转中是直接向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报告的，并不受英国外交部管辖。

二、国民政府的反击

1943年，在卡罗政策的指导下，英属印度已经开始渐进式的侵蚀中国西藏的土地，为了不引起英国外交部的焦虑，这种侵蚀暂时到达旺³⁴就停了下来³⁵，而他的真正目的是以达旺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按照噶厦的一贯作风，他们必然将责任推给“外交局”。按照卡罗的估计，这几乎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签署一个“英藏协议”，以巩固他的“蒙古边缘”防御体系，又实现将西藏改造成“缓冲国”的目的。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事沈宗瀚³⁶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接替与噶厦关系恶劣且多次提出辞呈的孔庆宗³⁷。1944年8月8日，沈宗瀚经印度抵拉萨，成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二任处长。由此开启了中英双方从1944到1947年之间在这一领域的较量。

1944年4月17日，日本为打通中国沦陷区与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造成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除了军事上的失利，这次失败更造成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关系的决裂，史迪威将军将此次大溃退的原因直接指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虽然最后史迪威将军被撤换，但也极大损害了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看法。而欧亚大陆的另一端，1944年6月6日开始的、以美英联军为主的诺曼底登陆战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很明显，这一时期伦敦对华盛顿的影响要比重庆大很多，而重庆方面也无暇像1942、1943年那般关注西藏事务。这给了卡罗绝佳的机会，去悄悄贯彻他已经成形的

34 达旺位于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南。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命其弟子前往该地建寺，取名门（域）达旺甘丹郎杰拉孜寺。地以寺名。“达旺”藏语意为“马头神灌顶处”。也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

3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55,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undated.

36 沈宗瀚，吴兴县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24年与清华留美同学成立“大江会”。1925年毕业回国后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44年赴西藏接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在西藏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扭转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恶化的局面。并劝导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于1946年初到南京，并出席制宪国民大会。1947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9年移居美国。195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了《西藏与西藏人》（与柳陞祺合著）一书。

37 孔庆宗，字廷素，四川省长寿县人。孔庆宗早年自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副领事，并同时在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1年归国，曾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任教。1930年代中期，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1940年3月25日，应邀赴西藏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任命孔庆宗为第一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1日驻藏办事处正式在拉萨成立。1943年10月18日，蒙藏委员会批准了孔庆宗因病辞职，并且决定让沈宗瀚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

“卡罗主义”³⁸思想。

1944年5月,在前往西藏的途中,沈宗瀚曾在新德里与卡罗会面³⁹,根据沈宗瀚给蒙藏委员会的汇报,他与卡罗一共进行了5次私人谈话,以交换“个人”意见。在谈到宗主权问题时,卡罗对“宗主权”一辞加以解释。彼谓:依据牛津字典之释义,宗主权系指中古时代封建制度时藩邦对其君主之关系,实际君主对其藩邦究有若干权限并无详明界说。现代国家人都系依照习惯与事实而执行之。彼又谓:宗主权为以空虚不确实之名称,故可有各种便利之使用法。彼引挪威、瑞典及英国与印度各藩邦之关系为例,以申其说。”⁴⁰

沈宗瀚回应:“宗主权虽可有各种解释,然宗主国对其属地必须有外交代表权,否则宗主权即无异不存在。”卡罗回答说:“事实上西藏除在重庆派有代表外,此外并无外交代表。”⁴¹

但如果我们还记得卡罗给印度事务部大臣发的秘密电报的话,就会发现在此卡罗耍了心机。他很清楚哪怕是“宗主权”,在最低限度上也是包含外交权的,但却在与沈宗瀚的交谈中故意不提,企图诱使沈宗瀚相信这一说法。而当沈宗瀚坚持“宗主权”必须包含外交权时,卡罗则故意将西藏地方驻中央的代表说成是类似于外交代表的存在。

对此,沈宗瀚的解读是:“由卡氏对宗主权之解释,可知中藏关系端在吾人之努力,如吾人实力上能加强对西藏之统治,英方似亦难作有力之阻挠,根据宗主权中央将藏地外交权完全收回,似亦非不可能。”⁴² 时任沈宗瀚的主任秘书陈锡章则将卡罗的话总结为:

38 卡罗主义:英国历史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将卡罗的西藏政策称为“卡罗主义”(Caroe doctrine)。从卡罗自己的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卡罗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一劳永逸地定义西藏的地位;结合笔者本人研究,可以扩展为:“卡罗主义”是为了实现将西藏变为“缓冲国”的目的,在英属印度政府对外事务部卡罗的领导下不断诱使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英国、美国等发生直接的、可以被他们定义为“外交”的关系,以此来彰显在英国定义下的西藏“自治”,甚至是“独立”。显然,“卡罗主义”并非卡罗的独创,而是印度次大陆上的英国人一以贯之的“保卫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的思维,但只有卡罗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政策来执行,而不是寇松式的冒险,并且试图将西藏地方能够接触到的范围扩大到大西洋的两端——伦敦和华盛顿。

39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发生在沈宗瀚在外交部任职期间,与戴季陶出访缅甸及印度。

40 《沈宗瀚与英印政府外交部长卡罗谈话记录》,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3153-3154。

41 《沈宗瀚与英印政府外交部长卡罗谈话记录》,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3153-3155。

42 《沈宗瀚与英印政府外交部长卡罗谈话记录》,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3155。

“当国家实力强大时，宗主权可说是与主权相等，并无分别，否则就另当别论了。”⁴³

沈宗瀚于1944年8月8日抵达拉萨，受到热烈欢迎。而在此之前，沈宗瀚就已经得知西藏地方政府安排的欢迎人员之中有“外交局”成员⁴⁴，因此沈宗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更换人员，并得到同意⁴⁵。噶厦不可能不知道沈宗瀚此举的意图是拒绝与“外交局”打交道，但在此噶厦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反而默认了沈宗瀚的意图。甚至在沈宗瀚进入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给他配备的护卫队还手持青天白日旗行进⁴⁶。黎吉生(Richardson)⁴⁷曾在1944年6月5日至9月19日间短暂接替休假的谢里夫(Sheriff)⁴⁸掌管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处，期间黎吉生曾询问“外交局”的官员是否将沈宗瀚视作与他一样的身份，结果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听到谣传说西藏政府决定承认沈先生如同英国代表处的官员一样的地位，我向外交局询问是否属实，他们否定了它。”⁴⁹

不同于孔庆宗的僵硬⁵⁰，沈宗瀚在处理在藏汉人管辖权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他公开称，“由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将在藏汉人的管辖权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⁵¹并在到达拉萨不久就警告在拉萨的汉人，不要将他们与藏族人的个人冲突告到驻藏办事处来，否则不论缘由先打500鞭子⁵²。甚至在发生汉人袭击藏警的事件后，沈宗瀚还主动赔钱了事，与孔庆宗的做事风格形成强烈对比。加上沈宗瀚在向寺院布施和招待拉萨贵族方面的大手笔，自然赢得寺院集团与贵族们的欢心。

43 陈锡章：《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资料，1984：111。

44 国民政府在拉萨有派驻军统、中统特务。

4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Arrival of Mr. Shen at Lhasa, From H.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0th August 1944.

4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Arrival of Mr. Shen at Lhasa, From H.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0th August 1944.

47 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 1905-2000年)，早年在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学习。1930年10月9日进入印度文官系统，之后被派往俾路支省，成为卡罗的下属。1936年7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1936年至1940年，1946年至1950年，成为英国和独立后的印度驻拉萨商务代表。

48 乔治·谢里夫(George Sherriff, 1898-1967年)，出生于英国拉伯特，早年在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学习。一战期间加入皇家要塞炮兵队，在法国负伤。1927年到1931年，他担任英国驻喀什的副领事，总领事为威廉逊。1943年接替卢德诺，成为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1950年回到英国，1967年去世。

4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Arrival of Mr. Shen at Lhasa, From H.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0th August 1944.

50 孔庆宗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期间对西藏地方政府、拉萨贵族的态度颇为强硬，按照当时在拉萨的汉僧邢肃芝的话说便是，孔庆宗“一心要恢复以前满清驻藏大臣的各种权力”。参见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建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252。

5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From Gould,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6th September 1944.

5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From Major G. Sherriff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3rd December 1944.

在藏期间,沈宗瀚继续拒绝与“外交局”发生任何正式的联系,却与“外交局”官员私下往来密切。这里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外交局”俗官主管——索康·旺钦才旦。在“外交局事件”期间,孔庆宗曾报告“颇具世界眼光的某藏人”告诉他“西藏虽欲独立,但无资格能力,终必依一大国,中央对藏向有主属关系,不比外国,不能归入外交局,中央如欲保藏,须及时设法加以处理,免依他邦。”⁵³令人好奇的是孔庆宗在这样官方的电报中居然不愿提及此藏人的真实身份。从当时拉萨政治圈来看,能具备“世界眼光”的官员,不过三人——擦绒·达桑占堆⁵⁴、索康·旺钦才旦⁵⁵、强俄巴·仁增多吉⁵⁶。从内容来看,这句“深刻”见解的前半部分确实很像擦绒所说⁵⁷,但以擦绒的经历来看,后半部分如此内向的表达不似出自擦绒之口。而从中英两国的档案来看,承担翻译角色的强俄巴·仁增多吉主要是与驻拉萨的英国人打交道,与驻藏办事处的往来不多。剩下就只有“外交局”的俗官负责人——索康·旺钦才旦。乍一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外交局”的最高俗官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表达。

而事实上,索康·旺钦才旦一直是民国西藏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人物⁵⁸,但无论是孔庆宗还是沈宗瀚,都没有对其进行过批评。特别是沈宗瀚,甚至对索康·旺钦才旦颇为赏识。与中央政府的驻藏官员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英国人黎吉生,他认为:“索康扎萨是一位具有主导能力的人物……总的来说,他似乎是个追逐私利的利己主义者。某种程

53 《孔庆宗为噶厦拒绝院议应严予驳责事致蒙藏委员会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2847-2848。

54 擦绒·达桑占堆,1888年出身于西藏彭波地区一个卑微的工匠家庭,1910年曾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途中因保卫有功,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器重,1913年任命他为藏军总司令,受封“扎萨”头衔,1914年出任噶伦。后由于对其亲英思想的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25年解除了他藏军总司令的职务,离开噶厦。但卸任后的擦绒依旧在西藏地方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55 索康·旺钦才旦,1913年成为颇本,1917年出任代本,1933年受封扎萨克,1936年成为昌都总管,1942年被任命为“外交局”俗官主管。索康·旺钦才旦颇具政治野心,摇摆于中央与英国之间。

56 强俄巴·仁增多吉,1900年出生在堆龙德庆县一个中等贵族仁岗巴家里。1913年赴英国贵族学校拉格比公学学习,毕业返回拉萨后修建夺底电站。同时因为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识并通晓英语,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翻译。曾在多位锡金政治专员、纳粹德国探险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小托尔斯泰和杜兰到访拉萨时担任接待与翻译的角色;作为翻译也周旋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处之间。1945年在拉萨病逝。

57 戴新三的日记曾记载,擦绒说:“西藏形式而论,只能英国势力强归顺英国,中国势力强归顺中国,不能妄想独立也”。参见邹敏:《1942年“藏警案”的历史记忆文本与基本史实》,《藏学学刊》第12辑,2015:281。

58 有趣的是,在对索康·旺钦才旦的观察上,戴新三与黎吉生颇具相似之处,都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戴新三认为索康·旺钦才旦想要激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迫使中央政府出兵西藏,最终利用其家族在昌都的军事势力依附中央,以效仿清代藏王。参见戴新三:《拉萨日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日,转引自王川:《戴新三1943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2):144。

度上处在中国人的影响之下……他比任何人都聪明，而且极度相信自己的能力。”⁵⁹

沈宗瀚必定察觉到了对索康·旺钦才旦具有可争取的空间，并与其达成了秘密协议，“（一）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二）西藏军队由中央负责供给军械派员训练；（三）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⁶⁰ 因此，对于“外交局”的性质，沈宗瀚必然也有一定的了解。事实上，“外交局”的很重要一部分工作就在于处理贸易问题。甚至有关贸易问题的案件都由“外交局”进行审理⁶¹。而英国人也利用贸易问题来鼓动“外交局”与美国发生关系，这方面的其中一例便是1945年谢里夫曾通知索康，他们可以通过加尔各答的港口将羊毛出口到美国去了⁶²。索康·旺钦才旦在竞争噶伦职位失败后，曾请假三个月，利用职务之便到印度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⁶³。因此，沈宗瀚在运作西藏地方代表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时，便利用了这一点——利用与索康家族的密切关系，以与内地贸易的低税率来吸引索康·旺钦才旦⁶⁴。

最初，西藏地方政府只打算派西藏驻京办事处的代表出席国民大会，但经过沈宗瀚的游说，蒙藏委员会报告了西藏地方政府准备派出地位较高的代表出席⁶⁵。根据黎吉生的报告，沈宗瀚游说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层僧俗官员，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每一位噶伦都谈过，甚至与摄政达扎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期间只有作为翻译的李国霖在场⁶⁶。甚至之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胞兄嘉乐顿珠和姐夫黄国桢与西藏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一起前往南京也是由摄政达扎直接批准的⁶⁷。

可见，沈宗瀚在藏期间对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沈宗瀚对于自己在西藏期间的工作也有较高的评价，在他与柳陞祺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他这样评价：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更明显的进展似出现在1947年，

59 印度事务部档案，IOR L/P&S/12/4197, Richardson Report of Lhasa Mission in 1946, January 16, 1947.

60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档号：001-059200-0009，台北“国史馆”档案。

61 格龙·洛桑旦增：《格龙·洛桑旦增自传》，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61。

6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Lhasa Letter for Weed Ending 8th October 1945. 8th October 1945.

6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7, Yatung News Report for the Period Ending the 31th May 1944. 31th May 1944.

6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2, From Major G. Sherriff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2th April 1945.

65 《蒙藏委员会为西藏改派国民大会代表事致国民政府政务局代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2991。

6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Lhasa Letter for Weed Ending 4th February 1945. 4th February 1945.

67 《沈宗瀚为达赖喇嘛胞兄嘉乐顿珠等来京观光觐见蒋介石能否与国大代表同行等事致蒙藏委员会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3007。

拉萨代表团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参与起草宪法草案和选举总统。”⁶⁸

三、拉萨博弈场

在沈宗瀚入藏之前，1943年10月11日，中央社消息称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达扎因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而发来一封贺电，“我非常高兴地获悉，阁下被我们祖国的人民授予民国主席的职务。”⁶⁹根据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谢里夫的报告，11日在拉萨有为庆祝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而进行的游行⁷⁰。事后谢里夫向“外交局”询问有关事件的情况，但只得到一些推诿的、模棱两可的回答⁷¹。期间，强俄巴·仁增多吉曾询问谢里夫是如何得到这封电报的，对此谢里夫个人的感受是：西藏地方政府并不知道祝贺内容已经公开见诸报端，而他们此时最关心的是英国对此的态度⁷²。这说明西藏地方政府确实有向蒋介石发去贺电，这让英国人恼怒不已。

10月20日，索康·旺钦才旦在与谢里夫的闲聊中突然发问，“宗主权究竟是什么意思？”谢里夫认为索康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已经看过了1914年的条约文本”。⁷³印度事务部认识到如何定义“宗主权”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但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需要坚持的是在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中保持灵活的实用主义⁷⁴。

这样的情况显然对卡罗有利，给了他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抵消西藏地方政府给蒋介石发去贺电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将英属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领土的侵蚀合法化，卡罗决定于1944年再次派经验丰富的锡金政治专员（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古德（Gould）入藏。当卡罗与沈宗瀚多次面谈后，他一定庆幸自己早前的这一决定，就连古德本人也认为沈宗瀚对英国的利益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⁷⁵。

卡罗对于古德的拉萨之行做出的指示是，英国只承认中国的“名义上的宗主权”，

68 沈宗瀚、柳陞祺著，柳晓青译：《西藏与西藏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68-69。

6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60, The Regent of Tibet sends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to President Chiang. November 6, 1943.

7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5760, Lhasa Letter for Weed Ending October 24th, 1943, October 24, 1943.

7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8, From G. Sherriff to Sir B.J. Gould, October 25, 1943.

7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8, From G. Sherriff to Sir B.J. Gould, October 25, 1943.

73 指未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文本。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8, From G. Sherriff to Sir B.J. Gould, October 20, 1943.

74 印度事务部档案，IOR L/P&S/12/4210, Ashley Clarke, Foreign Office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November 1, 1943.

75 印度事务部档案，IOR L/P&S/12/4217, Indi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ly 8, 1944.

并准备给予西藏“完全的外交地位”。⁷⁶ 卡罗认为要让西藏实现“完全的外交地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首先是一个短期、快速能实现的目标——诱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一名代表驻甘托克 (Gangtok)⁷⁷。实际上这是卡罗之前提出的在印度本土设立“西藏领事馆”方案的变种⁷⁸, 卡罗唯一的“妥协”是将想象的驻在地由新德里改换成了锡金政治专员官邸所在的甘托克。但他的建议仍然被英国外交部否决, 他们担心这将激起中国强烈的外交行动⁷⁹。而另一个途径则需要时间较长才能达到效果, 却荼毒更甚——策动“外交局”向美国派出代表团, 并向罗斯福总统进献礼物⁸⁰, 以作为 1943 年美国战略情报局送来的罗斯福总统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礼物的还礼。

卡罗的这两项指示由于缺乏英国外交部的支持而未能立即执行, 却在之后数年内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虽然设立“西藏领事馆”的方案再一次被否决, 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却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可以邀请西藏高级宗教文化代表团到印度⁸¹。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1946 年亚洲关系会议⁸²上, 西藏地方政府被邀请出席的原因, 艾登的建议给了卡罗及其门徒以启发。另一方面, 卡罗认为当时小托尔斯泰和杜兰是直接将礼物和信件呈递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 并未经过中国中央政府的驻藏官员⁸³, 所以当“外交局”的代表团到美国时, 也可不经中国驻华盛顿大使, 直接将礼物送给美国总统。可以推测这一想法一定通过黎吉生传递给了夏格巴⁸⁴。后者从 1946 年开始与黎吉生联系的密切程

76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6,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Zenodotia, London, 3rd April 1944.

77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6,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Zenodotia, London, 3rd April 1944.

78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35756,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ne 1, 1943.

79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6, Ashley Clarke,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India Office, 24th May 1944.

80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6,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Zenodotia, London, 3rd April 1944.

81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6, Ashley Clarke,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India Office, 24th May 1944.

82 亚洲关系会议: 又称为泛亚洲会议, 1947 年 3 至 4 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承载的是印度想要在亚洲及远东事务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野心,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认为“不结盟政策”其实是尼赫鲁及梅农为降低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激烈程度的一种策略。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外交经验明显高出印度一筹。他们总是在重要问题上胜过印度, 包括“西藏问题”。这次会议无疑是尼赫鲁个人的成功, 但政治的成功则属于中国。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63541, From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Mr. Warner, 9th May 1947.

83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41857, O.K. Caroe,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7th August 1944.

84 夏格巴·旺秋德丹, 拉萨贵族, 著名分裂分子。其父夏格巴·扎西彭措曾任拉萨米本。噶伦赤门·罗布旺杰之侄。1930 年, 23 岁的夏格巴进入西藏地方政府任职。1939 年被任命为孜本。从 1947 年底到 1949 年初, 夏格巴作为摄政达扎的亲信, 被派为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 在国际上制造分裂活动。

度已经大大超出一般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该有的水平，甚至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黎吉生的情报来源⁸⁵。

为了加强对美国的宣传，对抗双橡园⁸⁶在美国的影响，卡罗特意邀请《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印度的首席记者斯蒂尔（Steele）与古德一起进藏，他相信“公正的美国记者”将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⁸⁷同时“外交局”俗官主管索康·旺钦才旦也表现出对斯蒂尔入藏的强烈兴趣。黎吉生在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表示，“我抓住机会解释了斯蒂尔先生这次造访对于西藏政府的价值。”⁸⁸但卡罗的努力并未取得效果，在拉萨期间斯蒂尔多次与沈宗瀚进行交谈，从斯蒂尔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欣赏这位哈佛毕业生。沈宗瀚在会见中说中国中央政府准备给予“西藏自治”，不干涉西藏地方政府的内部事务，但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必须收归中央。同时，在美国多年，深知美国社会一直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有所厌恶的沈宗瀚还尖锐地对斯蒂尔指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而在中国与英国之间。”⁸⁹这一定给了斯蒂尔很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返回美国之前还专门绕道重庆，采访了与美国渊源颇深的宋子文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宋子文表示中央政府愿意怀柔治藏，甚至可以在自治的程度上做出一定让步，但也重申，外交权必须收归中央。同时，宋子文还嘲笑了“宗主权”一词，认为这种词汇早已落后于时代⁹⁰。结果，美国记者的“公正”与“真实”未能使卡罗等人感到满意⁹¹。

1944年8月31日，古德到达拉萨，由于在沈宗瀚进藏途中，古德在甘托克对其进行了热情接待，古德对沈宗瀚个人也颇为欣赏，双方的私人关系不错。而沈宗瀚也私下对古德表示，愿意直接与英国就“西藏问题”展开商谈。此时英国人知晓了沈宗瀚在国民政府中的位阶要比孔庆宗高很多，并可以直接联系蒋介石；卡罗也在与沈宗瀚的私下

8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53615, Tibetan Goodwill Mission, From H.E. Richardson to A. J. Hopkinson,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8th May 1946.

86 双橡园曾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官邸。

8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7, O.K. Caroe,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Mr. Peel, India Office, 7th August 1944.

8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7, Lhasa Letter for Week Ending 18th June 1944. 18th June 1944.

8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8, Visit of Mr. Steele to Lhasa, Enclosure in India Foreign Secretary's Letter No.40 dated 3rd October 1944.

9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H.E. Richardson,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ir B.J.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5th October 1945.

9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858, Visit of Mr. Steele to Lhasa, Enclosure in India Foreign Secretary's Letter No.40 dated 3rd October 1944.

交谈中得出他的结论——沈宗瀚是奉蒋介石之命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自治的限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卡罗认为既然沈宗瀚与古德这两位处理边疆事务的高级官员都身处拉萨，那么他们之间的讨论将不可避免⁹²。古德同意卡罗的看法，并认为他与沈宗瀚在拉萨的讨论是“安全的”，可以“避免引起俄国的注意”。⁹³但卡罗认为，双方的讨论只能限定在“中国与西藏关系的本质”之上⁹⁴。

在讨论中，沈宗瀚明确的对古德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公众观点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定义”，“中国中央政府准备给予西藏自治，但不会接受‘宗主权’一词”，⁹⁵“(中国)不可能接受一位西藏的领事官员出现在印度。”⁹⁶沈宗瀚也暗示，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出现要求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声音，但被蒋介石给抑制住了⁹⁷，以此来向英属印度方面施压。

黎吉生则对于沈宗瀚与古德的讨论不甚满意，他认为讨论“自治”的程度实际上是英国政策的倒退，并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极力避免西藏与国际进行接触”。⁹⁸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黎吉生非常直白的表示，“中国公众的观点并不重要”。⁹⁹作为这一时期“前进派”先锋人物的卡罗同样不满沈宗瀚的发言，他认为西藏的“自治”必须包含与英国和印度直接交往的权力，并让古德警告沈宗瀚这事关英国的利益¹⁰⁰。

卡罗对于“自治”的定义不得不再一次引起英国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印度事务部认为他们不能接受沈宗瀚的说法，而“西藏应该完全控制自己的对外关系”。¹⁰¹但英国

9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7th September 1944.

9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From Gould,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7th September 1944.

9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7,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6th July 1944.

9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4th October 1944.

9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0th October 1944.

9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4th October 1944.

9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7, H.E. Richard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ibet to Sir B.J.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6th July 1945.

9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7, H.E. Richard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ibet to Sir B.J.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6th July 1945.

10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From Foreign, New Delhi to Gould, Lhasa, 29th November 1944.

10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Mr. F.A.K. Eterison, India Office to Mr. Sterndale Bennett, Foreign Office, 11th October 1944.

外交部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危险，如果西藏愿意与俄国交往，这是英国不能承受的¹⁰²。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内的亲英派还提出希望英国帮助其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并暗示需要英国的武力支持¹⁰³。英国外交部认为西藏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必然受到中国 and 美国的反对，应该用参加“国际讨论”来代替和平会议¹⁰⁴。然而，由于分歧过大¹⁰⁵，最终这一问题被提交给战争内阁决定。按照英国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势力划分，内阁几乎无悬念地站在外交部一边，出台了《艾德备忘录》(Aide Memoire)，却很好地体现了“卡罗主义”。其主要内容为：“自治”在最低限度上应包含与印度的直接关系；由于英国与中国为同盟国，英国不会对西藏进行军事支持行动；西藏地方政府想要出席战后和平会议是不合适的；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谈判应该以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为基础¹⁰⁶。

在这样的定调下，古德与沈宗瀚的讨论也因此无法得出任何有益的结果，古德认为，剩下的工作已经无法在拉萨进行。在古德离开拉萨之前，古德将《艾德备忘录》的内容告知了噶厦¹⁰⁷，噶厦暗示说他们将把“自治”是否包含与印度的直接关系这一问题交由英国来决定¹⁰⁸。但与此同时，黎吉生的报告则称“西藏对英国的信心正在发生动摇。”¹⁰⁹

就在古德离开拉萨不久，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谢里夫报告说西藏的民众大会对麦克马洪线问题进行了数天的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英国侵占了西藏的土地，是“大虫吃小虫”的行为，并暗示有可能会废除1914年的条约¹¹⁰。这让身处新德里的卡罗大为光火，他认为西藏突然的强硬态度是由于“对

10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Mr. Sterndale Bennett, Foreign Office to Mr. F.A.K. Eterrisson, India Office, 12th October 1944.

10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8th November 1944.

10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Mr. Sterndale Bennett to Mr. Harrison, (India Office), 8th October 1944.

105 英国外交部对于中英之间的问题，显然更看重香港。

10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Aide Memoire, B.J.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read out to Kashag, 4th December 1944.

10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Aide Memoire, B.J.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read out to Kashag, 4th December 1944.

10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9,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4th November 1944.

10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H.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9th July 1944.

110 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欺骗，西藏地方政府方面不知道《西姆拉条约》及其附件都是无效的。

英友好官员的去世”和沈宗瀚对寺院集团的影响¹¹¹。

卡罗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伦敦报告，并给出了“大棒加胡萝卜”的建议——向西藏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只有坚持1914年的条约，英国才会给予西藏需要的“外交支持”；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西藏的“国际地位”。¹¹²印度事务部一如既往地同意卡罗的看法，但卡罗一心想要将他的“西藏领事馆”计划从垃圾桶中捡出来的做法让他们尴尬。卡罗提出“非英国人进藏需要由各国领事馆直接向西藏方面提出申请”，而这种申请可以由“外交局”授权亚东贸易代表来进行处理¹¹³。卡罗的建议部分得到了“外交局”的响应，希望美国公民的入藏申请能由他们直接办理。这是因为在英属印度的“前进派”官员的长期鼓动下，“外交局”也渴望与美国取得直接的联系。

四、西藏地方之态度

1945年8月，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称可以给予西藏“高度自治”。¹¹⁴卡罗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这只是蒋介石对外宣传的手段，并对此进行最后一搏，再次向伦敦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是否应该将“西藏问题”国际化¹¹⁵。

与此同时，为了抵抗沈宗瀚在拉萨不断提升的影响力¹¹⁶，卡罗同意谢里夫的建议，派出新任锡金政治专员霍普金森（Hopkinson）入藏。但霍普金森生性浮躁，“霍系江孜之英驻军军官，为人粗鲁率直，对藏人时以大国代表自居。再英方对藏有所希求，径向藏方表示，不知使用手腕，远不如古德之圆滑，以及善于运用。藏人深知其出身，且不满其行为，对之印象已坏，其送藏中显要之礼品虽被接受，但收后即被痛骂。”¹¹⁷

当霍普金森到拉萨后，“外交局”一再阻止他接触到噶厦，这让他大为光火。“我不

11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1,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4th June 1945.

11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2, From O.K. Caroe to R.T. Peel, 3rd May 1945.

11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2, From O.K. Caroe to R.T. Peel, 3rd May 1945.

114 《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73。

11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3, From th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the Secretary External Department, India Office, 19th September 1945.

116 之前古德认为英语学校就是英国与西藏关系的试金石，而英语学校的破产显示了沈宗瀚在拉萨影响力的提升。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3th September 1944.

117 《陈质平为西藏派遣国大代表等事复外交部电》，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1994：3002。

反对这样一个机构作为英国驻藏代表处的联络渠道而存在。但我必须指出它插入在噶厦和锡金政治专员之间对我造成了不利影响……除非我们小心行事，否则这样一个机构将在协商者和负责当局之间造成更多阻碍。”¹¹⁸ 黎吉生则在给霍普金森的建议中无力地为“外交局”辩解了一下，“外交局的存在是为了厘清基础的细节并减少（对噶厦来说的）糟糕的事情出现，虽然它在实践中是如此的低效。”¹¹⁹ 黎吉生矛盾的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一方面需要安抚霍普金森暴躁的脾气，另一方面非常清楚“外交局”的利用价值——“作为英藏关系的附属产物，新成立的外交局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实施任务的创新工具。”¹²⁰ 经过与“外交局”三次无效的交流之后霍普金森发了火，“外交局”才终于同意安排霍普金森与噶厦的会见¹²¹。但正如霍普金森预计的那样，“噶厦，即使我成功的见到了他们，我很清楚责任又会被推到民众大会头上”。¹²² 在与彭康噶伦和噶伦喇嘛的私下会谈中，他们都对霍普金森表示，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成年之前，噶厦不会在任何重大事务上作出表态¹²³。

霍普金森在拉萨的工作并未取得任何效果的同时，沈宗濂运作的西藏地方代表出席国民大会的准备工作却已经逐渐取得成果，这也被霍普金森所知晓。但西藏地方政府却一直对霍普金森否认西藏代表团要出席国民大会，称他们只是去祝贺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¹²⁴。在卡罗要求霍普金森警告噶厦及摄政出席国民大会的后果无效后，霍普金森则返回印度，为阻拦西藏代表团前往中国内地做准备。

为了继续对西藏地方政府施压，卡罗派出他手下最得意的“门徒”黎吉生¹²⁵前往拉

11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3, A.J. Hopkin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C.B. Duke, Joint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31th October 1945.

11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3, From H.E. Richardson to A.J. Hopkinson, 22th November 1945.

1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1588, From H.E. Richardson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9th July 1944.

12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3, From A.J. Hopkin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C.B. Duke, Joint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31th October 1945.

12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46123, From A.J. Hopkin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C.B. Duke, Joint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31th October 1945.

12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53613, From A.J. Hopkinson,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Foreign, New Delhi, 23th December 1945.

12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53613, From Hopkinson,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9th January 1946. 这种说法后来被一些心怀偏见的西方学者广泛引用。

125 黎吉生作为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其官阶高于所有前任，黎吉生曾任英属印度政府对外事务部的助理外交大臣和江孜贸易代表。

萨接管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处¹²⁶。1946年3月底,作为“西藏通”的黎吉生一到达拉萨,就立即向“外交局”提出会见摄政和噶厦的要求,而索康·旺钦才旦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并通过一再保证西藏代表团将不会出席国民大会的方式来敷衍黎吉生¹²⁷。其后,黎吉生通过其私人关系,私下会见了一名噶伦,该噶伦对黎吉生说,噶厦从来没有下过命令说西藏代表团不能参加国民大会¹²⁸。这让黎吉生非常震惊,随后他认定索康就是在背后运作此事的“邪恶天才”(Evil Genius)¹²⁹。因为索康·旺钦才旦,甚至是整个索康家族都与沈宗瀚联系频繁。而噶厦在这方面的看法也是被索康·旺钦才旦左右的,特别鉴于在噶厦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索康·旺钦格勒噶伦正是索康·旺钦才旦之子。另一方面,黎吉生私下会见了噶伦喇嘛后得知,噶伦喇嘛甚至不知道西藏代表团将要离开印度的日期。索康·旺钦才旦还向黎吉生表示,他已经指示西藏代表团与国民大会保持距离,但这已经又被噶须巴噶伦给否定了。因此,黎吉生得出结论,认为索康·旺钦才旦要么是在进行危险的政治游戏,要么就已经“背叛”了噶厦¹³⁰。

在黎吉生的压力下,噶厦不得不表态说会召回代表团,可实际却没有得到执行。随后,“外交局”任命了一位低级别的助理官员¹³¹,俗官主管索康·旺钦才旦和僧官主管土登却殿则先后请假前往江孜¹³²,明显是在逃避黎吉生的询问与施压。

当西藏代表团到达南京后,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森(Stevenson)也与西藏代表团有过会见,当史蒂文森问西藏代表团是否出席国民大会时,只得到了一个非常模棱两可

126 面对拉萨复杂的局势,霍普金森并不愿在拉萨待下去,而新德里方面似乎也愿意让黎吉生接替霍普金森的工作。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3, From Hopkinson,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1th December 1945 与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3, From Hopkinson,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3th December 1945.

127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4, From Jekyll,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Hopkinson,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st April 1946.

128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4, From Jekyll,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Hopkinson,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st April 1946.

129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130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131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6,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8th September 1946.

132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5,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4th August 1946. 与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53616,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29th September 1946.

的回答¹³³。之后，西藏代表团全程出席了制宪国民大会。正如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布的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总结性文件中描述的那样：“1941、1946、1947 和 1948 年，西藏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中国的许多国民大会，包括 1946-1947 年的制宪国民大会……这将暗示着西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¹³⁴

五、余论

从 1943 年到 1946 年间，中英双方围绕着西藏地方政府的所谓“外交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范围的博弈。英国政府试图重新思考“宗主权”问题，并希望取得美国的支持，但这一时期，在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介入的情况下，美国保持其一贯的政策立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到美国立场的限制，英国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多部门的讨论，最后依旧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般地将“宗主权”一词强加于中国，认为“除非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否则我们将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英属印度对外事务大臣卡罗对于这一决定并不满意，他希望利用“外交局”来实现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的“外交关系”，从而建立一个防卫印度的“缓冲国”。

但沈宗瀚的到来显然使卡罗的战略受到打击，沈宗瀚不仅多次重申了中国中央政府拥有处理西藏地方对外事务的权力，并且以灵活的手法来与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一方面拒绝与“外交局”有任何正式的往来；另一方面，沈宗瀚与“外交局”的俗官主管索康·旺钦才旦密切联系，甚至计划支持索康·旺钦才旦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改组。沈宗瀚还私下与索康·旺钦才旦达成协议，“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也察觉到了英属印度对西藏边界土地的侵蚀，加上沈宗瀚的运作，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出现明显亲中央的趋势，“外交局”也继续扮演“拖延”的角色，阻止英国人因为西藏地方的代表团出席国民代表大会而直接向噶厦施压。

所谓的“西藏问题”，在整个近代，始终笼罩在英国的帝国主义阴影之下。但 1943-1946 年间，国民政府在与英国的一系列博弈中取得了一定的治藏成绩，在外交上胜过了在南亚次大陆渐落黄昏的大英帝国。不幸的是，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在藏权威因为“热振事件”¹³⁵而断崖式的衰落。这表明“西藏问题”是随着中央政府的实力

13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53616, From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to the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26th October 1946.

13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158405,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ibet, 9th February 1961.

135 参见喜饶尼玛、冯翔：《“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中国藏学》2018（1）：48-57。

和决心的改变而改变的，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对内不惜采取强硬治藏政策，对外灵活地展开与英国的博弈。而内战中的国民政府投鼠忌器，导致藏事败坏，“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得不推迟至 1951 年。

◆ 冯翔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喜饶尼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